

蔡
铮

作品集

散文卷

生命的走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生命的走向

蔡锦

作品集

散文卷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走向 / 蔡铮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54-7023-2

I. 生… II. 蔡…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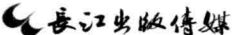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6979 号

责任编辑: 张远林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周 佳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3.2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8 千字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我们活着，今天活着，则我们已跟这宇宙一道活了一万年，一亿年，一亿亿万年——我们活在父母的生命里，活在祖父母的生命里，活在祖祖父母的生命里，活在我们的始祖的生命里，活在亿万年前的一粒细胞的生命里，活在亿万年前宇宙深处的一粒微尘里。一根脐带把我们与亿万年前的那颗微尘相联。如果其中有一环脱节，则我们根本不可能存在，不可能有现在这个生命。我们每个今天活着的人，其实已活了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我们一直就跟这个宇宙一道活着，只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我们每个人的年纪严格说来，不是二十、三十、五十或六十，而是亿万年，而是跟这宇宙的年纪一样。我们由两条途径接受并获取生命，又由两条途径传递与延续生命。一条纵向，从父母那儿接受并获得生命，又生儿育女延续并传递生命；一条横向，接受由他人生命构成的创造物，保障自己的生命并扩展自己的生命，又创造些什么，让自己的生命融进自己的创造物中，让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创造物中存活下去。

目 录

父亲的恩人	001
通知父亲	011
想起海子	017
小时候	022
我的高中	046
我献身国防的日子	071
为父笔记（之一）	105
为父笔记（之二）	113
二〇〇三年中国印象	118
信还是不信	184
编后记	199
附：网友评论	200

父亲的恩人

父亲一生有很多恩人，他常向我们念叨。想起父亲，就时时想起他的恩人。

父亲的第一个恩人大概是我姑爷。姑爷二十来岁即在汉口开一家制帽厂，农忙时常回家来帮忙。那年父亲九岁，伯父失踪，祖父病死，奶奶双眼几乎哭瞎。奶奶领着父亲守在家里。姑父来看他们，必拎一挂肉，丢下肉就走。他家距我们家五六里。他赶走不为别的，只怕奶奶把肉做给他吃。奶奶说，我想你陪我坐坐呀，他这才坐下来。留下来吃饭，他不沾他带的东西，说：带给你们吃的，都做给我吃了，那我带来干吗？那时我家有五斗田，跟人共一口塘取水灌溉。夏天常干旱，干极了就抢水，谁车出水来水就是谁家的。从塘里车水，得三架水车，六到十二个人，一级级地车上来。别人家里长工多，田里一干就车水。父亲孤儿寡母，又请不起那么多人，如何跟人争？但田里没水，一年的口粮就没了。祖母看着塘里的水少下去，田里发干，便托人带信到汉口去。汉口距家一百余里，祖母眼见塘里的水少下去，急得直哭，因为最早三天他才能回来，等他回来，塘里已干了。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就会是一



田枯草。信带出去的第二天天黑时，从对面山上走下来一大帮强人，扛着三架大水车。他们跑向那水塘，架起水车，喊着号子就车起来。号子嘹亮齐整，喊得那争水的长工全散了架，干脆丢下水车不车了。那领头喊号子的就是高高大大的姑爷。到要收割时，奶奶又只有请姑爷带人来帮忙。定好七月十八日。那天一早，奶奶打开门，见姑父和七八个人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打瞌睡。奶奶问：怎么不趁凉快去割呢？姑爷忙站起来，说，娘，割完了。我们夜来闲着没事，就趁月亮割了。奶奶大喜大惊，赶忙请他们进屋，埋怨他为什么不进屋歇息，姑爷说他们带了茶，外面凉快，不愿天不亮就惊醒他们。

后来姑爷把父亲带到身边在他的铺子里做学徒，又担心父亲弟兄一人，个子矮小，受人欺负，业余便把父亲送去习武。

姑父是父亲的恩人，又是父亲的英雄。他没上过大学，却是个师爷（律师），常替人打官司，打官司还从未输过。他能言善辩，几次从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刀口下说出一条活路。他无所不能，象棋下得满汉口没有敌手。但正是这象棋要了他的命。据说那是解放后要搞合作社时他到省政府开会，开会前大家围观人下棋，他也凑上去看。原来是省政府主席在与人下棋。这主席是我们邻村的，姑父打小认识。看了一会，见老乡就要输给人家，他一时忍不住，多了一句嘴，教了老乡一着。第二天他的一个好朋友一大早就慌忙火急地赶来对着他的耳朵说那主席认为他泼了他的面子，已派人扛了枪来抓他——那些人正在路上，快想法躲一躲；说完匆匆离去。姑父这才忽然想起老乡是将军，是主席，下完棋他脸色难看得很。现在是他们的天下，到处已莫名其妙地杀了好多人。日本人来了可以躲到乡下，乡下起了土匪又可以躲到城里，这会他们铁桶江山，那里躲去？他躲过了，这些兵痞不会拿他的家人出气？急得没了

辙，就喝了硝镔水（硫酸），想以一死救家人。家人急送他到协和医院。人活了下来，但喉咙烧坏了，只得在腹部开个孔，灌些汤水。如此活了三年才死。其实那天根本没人来抓他，不过是他一个生意上的敌人用的计策，透假信给他的真朋友。这是聪明一世的姑父一生中做的唯一蠢事。

姑父有两个儿子，在父亲看来都是天才，一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只是生而知之的表哥们二十五六岁在汉口还找不着对象——大概因为出身不好。他们只好到乡下来找。那是七十年代初，那时大城市里的人到乡下来找对象就像英国王子到平民中来挑王妃，看中准便是谁，又像农夫到自己的菜园子里摘片菜。父亲便介绍了我们大队最出色的姑娘与他们认识。可是平民瞧不上王子，于是表哥们一片菜叶都没摘到。没摘到一片菜叶的表哥们从此就与我们家没了往来。

我从未见过两个表哥，很想见见。但读大学时拿了门牌号码去汉口统一街四处找却老找不着他们，好像他们迁到下水道里藏了起来。听父亲说，姑妈特别漂亮，我想表哥身上该有她的影子，很想验证一下。几年前二哥终于在汉口见到了大表哥大表嫂，还有表侄女，女婿。表哥表嫂都放了长假，在家等待假期结束通知，已等了三年，边等边搓麻将。好在他们的房子已由政府退还，有他一份，他们出租给人，有点收入，不至于因等待而毙命。表侄女抽烟，一口黑牙，开口闭口“你的个斑马养的”，找了个小警察，也开口闭口“你的个斑马养的”。二表哥过得好一点，因为二表嫂戴眼镜。戴眼镜的表嫂一见人上她家就满脸都盖上镜片，两个表哥就没什么往来。二哥也没去过他家。据说他们有两个戴眼镜的姑娘，不知戴眼镜的表侄女们上过大学没有？

父亲的另一个恩人是干爷。干爷是大队的贫协组长。贫协组长是多



大的官我不知道，只知道大哥早年想转正时总要请上他，大概不是因为他是干爷，因为饭桌上连真爷——父亲的位置都没有，父亲只能跟我们一道在灶房吃他们吃剩下的。别的被大哥请上我们家来吃饭的都成天不在自己村里干活，成天在别人家里吃饭，干爷却是总在自己村里犁田，回自己家里吃饭。请他吃饭时他总在犁田，他总要拖，拖到最后。他要把那该犁的一点犁完，把牛牵回去，系到树阴下，上了草，才跟我一道走。他好像总在想心事，满脸的皱纹揪得紧紧的。

干爷救了父亲的命。一九五九年父亲在修水库时忽然浑身肿了起来，肿得像皮下打了气。可每天还得吃米与水为一比八百的稀饭，一日挑八十担土，从天亮干到天黑。稍一偷懒，就要挨斗。干爷一天看到父亲，说我给你个条子，你赶快拿这个条子到黄谷村学校去报到。他拿出笔来，在一张红纸片上打个叉，写上自己的名字。那时他是大队书记，他跟父亲一样，也只能写自己的名字。父亲有些发昏，以为让他换个地方干活，反正不行了，他准备死在那儿，那儿离家近一点。他揣了红纸条，按干爷说的到那学校。原来那是一所临时医院，里头已住满了人。父亲把条子交给管事的，马上有个医生来查看他。医生说你再晚来一天就谁也救不了你。立即给父亲开药。药一会就端上来，是三两黄豆稀饭。父亲巴不得一口倒进肚里，可医生在旁边盯着，不许他吃快。还跟他讲了许多要慢吃的道理——有许多人哽死了。从此后父亲就在那医院里住了下来。他跟所有的病人一样，只吃一种药：黄豆稀饭。早上三两，中午三两，晚上又是三两，吃完就躺着，或在院子里走走。这药真灵，几天下来人就活了过来，硬朗了起来。

那几年远近饿死了很多人，我们大队没有几个。父亲已前脚进了阎王殿，是干爷把他拉了回来。如果没有干爷那张条子，自然就没有了父

亲的下半生，也就没有我和二哥了。我不知是不是那时起干爷才成为干爷的。

在我印象里干爷没说过话。虽然我们村与他们村只隔一两里，我却很少见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哥还为转正的事不断请客，但再没请过干爷，不是因为他什么官也不是，而是因为转正的事已与土皇帝不相干了。前年哥来信说干爷的大儿子捐了二十万，重建了村小学。他的大儿子早年出去当工人，默默无闻，现在天津做了经理，想必很成功。但我不知干爷是否还健在？如健在，也该八十余岁了，他是跟儿子一起过呢还是一个人待在老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来了个姓韩的女医师。女医师生五十来岁，是下放来的，带着医箱。她孤单一人，住在小队的仓库里。仓库的一角有她一张床，一个小炉子。她跟村里妇女一道劳动，空余给人看病。父亲那一年没饿死，一双耳朵也健在，可忽然连打雷都听不见。本来耳朵于他没什么大用，反正按人家的手势办事就没错，还省了听母亲的咒骂；但父亲还想养几个孩子，听不到孩子的笑语他可受不了。于是就想治好。找了好几处医师，医师都像刚从水里爬上岸来的狗一样对他摇头摆脑，他便有些绝望。父亲向来瞧不起女的，那女医生来了好久，他都懒得去看她。后来还是那医生来找他，说想帮他治治。她让他每天下工后去扎银针，说她从前跟人扎过，很管用。父亲将信将疑，反正费不了多少工夫，又不费药钱，就决定试试。开始几天，父亲老搞忘了，到了傍晚她就背着医箱来找父亲。扎了十几天，父亲就感到耳朵里像刺开了一个小孔，漏进一点光线，一点声音。于是他主动去找她。大忙时，有回父亲一收工就去找她，远远地看到瘦骨伶仃的她歪歪倒倒进了仓库，门关上了，父亲就想，她今天太累了，受不了，肯定是要关门早点休息。



父亲便在仓库外老远的地方站着。可不一会仓库门就又开了。换了衣服的韩医生出来招呼他进去。父亲问：你不歇歇呀，今天就算了吧。韩医生说：一天都不能耽误，这也是歇呀，你不也累了一天吗？

父亲的耳朵里的小孔越开越大，韩医生也越来越高兴。可就在这时她突然被调走。临走她给父亲介绍了一个公社医院的医生，千叮嘱万叮嘱要父亲一定坚持去扎针，说坚持下去一定会好。父亲也去找过那个医生，那医生不大热情。而且医院隔家太远，他就懒得去。他的耳朵就半聋在那儿。“要是她不走就好了”，三十年后，父亲还反反复复念叨，“多好的人啦，她来给你看病，一滴开水都不沾你的。总是自己吃了夜饭才来。一个人做饭，拿个小煤烟炉子，烟熏火燎的，多难哪。”大队当时有个兽医，是邻村的，他到谁家去给猪看病，不吃点东西是决不离开。若是刚吃过早饭来给猪看的病，你要上工，要把门关上，他还是不走，他趴在你桌上打瞌睡，直等到你回来给他做了中饭吃了才肯走。

韩医生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去了何方。好人好医术，到哪儿都会受人爱戴，应该不会有很坏的结局吧？

一九七五年左右，我们队上的牛全都瘦得只剩骨头架子和没毛的皮。四处的青草不是被刨去沤做了肥料就是被人刨去做了柴火，牛没有青草可吃。农忙下来，牛得补点补点。于是当地政府与邻县联系，让队上的牛到他们那儿山里的农场去放牧。队上二十几条牛，得有个人去照看。这个人必须吃得苦，跟人合得来，又是跟这些牛一样累干了要歇着的。队上选中了父亲。在山里放牛，很舒服，只早上把牛赶出牛棚，傍晚黑把它们赶进牛棚。白天只在山坡上坐着，看着牛就行了。累了一夏的牛都很老实，只专心致志地吃草，渴了就到山下的小溪里去喝水，草足水饱之后就躺下来休息。父亲已是十几年没离开过家，这农场距家有四

五十里地，全是生人，自然寂寞。更麻烦的是吃饭。他得跟农场的人一道吃。农场都是青年人，饭还未熟就早拿着盘子筷子敲敲打打的守在饭堂门口。大师傅把饭锅往那台子上一端，这些等红了眼的青年人就都像饿急了猪一样扑上去，头碰得咚咚，盘碰得叮当，眨眼间一锅饭就没了，只剩几个瘦小的还在那儿刮那锅。接下来等菜。菜不过是南瓜，一端出来又是一哄而上。每人端个一大盘子，一个小盘子，有的盘子满满的，有的盘子只一点点。父亲又弱又老又生，只在一边看；等瘦人走光，他想去弄点锅巴，可走近一看，连锅巴都没了。以为那大师傅还会做，大师傅却拎起空空的锅，丢到厨房，锁上门就走了。大家都只顾着赶忙扒自己抢到的饭菜，谁也没望他一眼。队上是给了农场钱米让他搭伙的，可他只得吃从家里带来应急的炒米。吃了炒米渴得难受，又没开水喝。整个农场没有开水。他只得到山脚下的小溪里跟牛一道喝水。下午厂长来看他。厂长是个老人，他是自己回家吃饭。他赔礼说他不在，他知道那些年轻人多不懂事，不讲理。晚上开饭他就站在旁边，他一来就没人敢抢。他站在锅边，先给父亲盛上，然后叫做饭的打饭。“待老人就要像待你自己的老人一样！人家来了是客！你们不是畜生，是吧？怎么这点礼都不懂？”他教大师傅每餐先把父亲的那份饭菜留下，又给父亲一个水壶。从此父亲才有一口饭吃，有口水喝。可每餐都是南瓜，父亲受不了，他就弄些花生米，叫大师傅专为父亲炒了。但他不在，那些年轻人就不等花生米出锅就抢去吃了。他就又只得从他家里带些菜，装在罐头瓶里带给父亲。他时常到父亲放牛的地方来陪父亲聊天，一遍又一遍地为他拿那些年轻人没办法向父亲赔礼，“这些年轻人，没出过门，没受过苦，又没有文化，只有求你担当一点。”他有三个女儿，都出嫁了，只有一个老伴在家。得他的照顾，去时跟牛一样瘦弱的父亲两



个月下来身体好了许多。父亲回来后常说，没有那老厂长，他怕不能活着回来。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呢，问他为什么待他这么好，他说，哎呀，老蔡，都上了年纪了，哪个不出外？后来放了牛回来，父亲说这样的人一定要去填填情，于是大哥便买了几个罐头翻山越岭去谢他。老厂长还连连为没照看好父亲赔礼。罐头收下了，却非要哥带回一些山里的特产不可。

父亲年轻时常“推脚”——即推着小推车搬运货物。一年冬天，他和同村的三个人从河南推黄豆回来的路上忽然下起雪来。开初还可以慢慢走走，不一会就前后不见人，雪封了路，雪盖了天。他们看见路边有一户人家，就只得把车推到人家屋子侧面背风的地方歇下来。三个人都无计可施，望着天上的雪直往下垮，愁死了。本来以为可以就着月亮一天赶回去的，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身上的钱花光了，怎么办哪！正愁时那人家门开了，一个细细瘦瘦的妇人出来，一见他们就说：“哎呀，客呀，怎么还站在外头！怎么不进屋里来？还不快进来！”他们见是妇人，不敢进去，忙说身上什么钱也没有了，只有这些人家的货。妇人说：“看你们说哪里去了！我当家的也在外头跑，你们就只当回家了——快进来，进来。”接着叫出一家老人小孩出来迎接他们，帮他们把货弄进去。马上给他们烙饼烧汤。夜里又安排他们歇下。他们都以为歇一夜，明天太阳就会出来，就可以上路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天哪，门都打不开！半人深的雪，丢在门外的推车一点影子都没有！还上什么路！他们更不安了。白吃人家的，白喝人家的，他们一家在灶下吃麦米稀饭却给他们吃麦米饭，连那孩子都吃麦米稀饭。他们哪能咽得下？他们急得跺脚。人家存粮不多，这样吃下去不吃空了他们？那妇人说：“客呀，你们不要担心，就当是在自己家里。我当家的也在外头跑，也

遇上过这样的事，人家怎么待他，我们怎么待你。歇在我们家是我们的缘分，有我们一口，也有你们一口。千万不要见外。”他们待到第四天，就是死他们也不能再待下去了。见他们去意坚定，老汉弄来稻草，给他们从脚跟到腿根绑上稻草绳。密密的两层。他们先是不愿意被绑，老汉非要给他们绑不可，并叮嘱他们不到家一定不要松开。他们踩着齐腿跟的雪，走了一天走回来了。那草绳还真管用，里头的裤子一点也未湿。等了半个月，路干了，他们才去取车和黄豆。那黄豆架在离地的干燥地方。他们只给那家一点米，他们还死活不要。

我们小时，家里时时连轧米的钱都没有。轧完米，父亲就只好叫加工厂管轧米机的挖些糠以抵加工费。那管轧米机的是我们队上的和尚，跟大哥差不多年纪。和尚幼年丧父，长得瘦瘦小小的，背有点驼，脸上总挂着怜兮兮的笑。轧完米要过秤，论斤两收费，和尚总是略提一提秤，就叫出了斤两，一百斤叫的是八十，八十叫的是六十。父亲背驼，时常吐血，家里挑米挑水只有大哥一人能胜任，大哥在学校教书，常不见他的人影，父亲只有自己来，否则家里没吃的。有时赶上和尚回家，见父亲一步一步地挣扎着往前走，和尚就接过父亲的担子，给父亲挑到村子后面才把担子交给父亲。他常对着父亲的耳朵大喊：“你养那些儿有什么用！”又常对着我们摇头：“养你们这些儿干什么！”在他看来，父亲根本不该挑那担子，那肩挑背扛的事早该由我们接替了。

和尚还在，他娶了一个细瘦的媳妇。他们的孩子如今该念中学了吧？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读，成绩如何？

父亲在去世前好几年，时常病倒。村里形成规矩，凡有老人病了，每家都得买些礼品去看望。在我离家五年后回到家时，父亲指着春台上的罐头，药酒，砂糖，糕点：“这些情怎么填得了？欠人家太多了，总



是人家来看我，东西不断，都吃不完。”虽然许多东西并不很贵，但我们村里人并不富，自己病了也只不过买这些东西补养。父亲不安的是，他老病，一年要病十几回，每次都像要死，每当病得厉害一点人家就都带东西来看他。

父亲走了，小村子还停泊在那儿。在我高中毕业后的二十年里，村里只有两个人上了高中，一个是我侄女。村里破烂的公共茅房倒了，无人能扶起；村前那口塘淤积得快平了，也无人有力去掏泥。村里田地未见增多，各种税收名目却日新月异，款数也日高一日，好几家缴不起苛捐杂税，只得锁起门落荒而逃，从此没了踪影；又有些我小时的同伴滞留在家，因贫穷而未能娶亲，故而计划生育政策在我们村里非常成功，小村在过去的二十年人口未见增长。

父亲的恩人太多了。父亲时常为自己永远报答不了而不安。父亲不在了，我能替父亲做些什么来报答他的恩人呢？

通知父亲

父亲死后葬在奶奶坟边。据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哥哥请人看过，父亲也喜欢。父亲喜欢因为它向阳、背风。父亲怕冷——那地成圆椅形，挡住三面来风，独开的一面朝向正东方；地势很高，太阳一升起就能有光照；二是因为父亲跟奶奶最有感情，愿意跟奶奶挨着。

父亲安葬的前几天下过雨。新掘的墓穴里不一会就浸了水。挖干了，不一会水又浸进来。人们只好在穴底垫上四块砖。我们希望那水不至于挨到棺材，挨到棺材也不至于漫上来，到达那未密封的棺盖。

安葬完父亲的第二天，天又开始下雨。早春的冷雨淅淅沥沥下个没完。父亲是穿着一身崭新暖和的黑棉衣躺在棺材里的。父亲怕冷，我们弟兄坐在屋里，望着檐下不绝如练的雨水，一筹莫展，身如雨淋。雨下了一天，又一天，第三天大哥终于说：“看着老人在水里泡着，我们做后人的怎么安心？”于是我们三弟兄戴了斗笠，穿了蓑衣，扛着锄头、铁锹出了门。我们要在父亲坟前开出一条沟通到坟地下面去，使坟地前后不能积水。但在沟通到就要接近下面低地的地方，遇到了岩石。没想到下面的石头那么硬，只有爆破才能解决。我们挖了一天，精疲力竭，



满身泥水，只开出一条浅沟来，那坟前的水会流走一部分，但不能排尽。大哥只好说，邻乡把人葬在河边，把棺材丢在水里，更多的地方还火化，把人烧成灰。但我并未得到安慰，脑子里总有父亲浸在水里，棉袄透湿冰凉，脸浮在水面、双眼紧闭的镜头。

父亲本不该死。他得的是心肺病。病一来，他就不能吃饭，身上发肿。但打两支葡萄糖，吃点药，或者干脆硬挺几天就过去了。一好了，他就又什么都能做。病好病来，反反复复已好几年。在他死的前一两年，是我人生中的子夜。我幸免一死，又幸得自由，只是前功尽弃，被部队开了回来。为了所爱的一个小姑娘和父亲，我在老家待了下来。在县城一所中学代课，月薪七十，不够吃饭；姑娘跟人好了；大哥当民办教师，养他一家四口；二哥在家，侍奉病弱双亲，负债累累，二十有八，还无人提亲，眼看光棍打定了。那是春节过后，我考完研，感觉不佳，时常感到绝望，难免唉声叹气。父亲见状，更加愁苦，只怪我书未读到，胡作非为。他反反复复痛心疾首地慨叹：“你怎么这么傻！皇帝怎么能反呢！那是要满门抄斩的呀！”听说我被捕，他一病不起，已经垂死，待我安然归来，一见我他又顿时好转。既没有满门抄斩，又没有让我坐穿牢底，我又安然无恙，实在大喜过望。他对政府感激不尽。但全家希望破灭。两条光棍在父亲面前竖着，前途无望，他怎能不病？

医院父亲从未去过，邻村有人开了一个诊所，每当父亲生病加重，即呼来那医生。那医生勤恳敬业，招之即来。我考完研，回到家，父亲正病着。夜里痛起来，常双脚抖索，哼哼扣齿。问大哥二哥为何不请医生来，他们说赊欠太多，不敢再去，叫我去请。我身无分文，裹着破大衣，冒着寒风，去找那医生。医生一见我，就说：这大年纪了，还整什么，没有救了，让他早点走少受点苦。我是为你们好。你们家里又不宽